现代艺术与传播

2026年10月 第1卷第5期

统计学视野下的当代行书创作中的“二王”书风研究——以近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为例

郝璐佳

曼谷吞武里大学，曼谷

摘　要 | 本文以第五、六、七届书法兰亭奖中的“二王”风格行书作品为基数，通过统计学中的关系建模、数据提取等方式，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二王”风格行书入展率逐届走高；第二，此类作品趋向展大化；第三，“二王”行书风格丰富，而碑帖融合一路面貌趋同。当代“二王”行书创作的风格衍变，内在受其书法本体的包容性与原创精神制约，外在由展览效应、评审风向驱动。

关键词 | 兰亭奖；当代；行书；“二王”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关于“二王”书风的界定，不应仅限于羲献父子个人风格的范围。清代阮元于《南北书派论》说道：“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1]，而“疏放妍妙”则是以王羲之为首的历代帖学大家创作的审美共性。“二王”一脉的延续，关键在于用笔规律的沿袭，羊欣评其“兼撮众法，备成一家”[2]。除非学“二王”者在用笔上“破其法而非法”，有如颜真卿，“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王羲之）合哉”[3]亦是其用笔出新的有力论证。除“二王”和颜真卿风格外，当代行书创作逐渐形成碑帖融合之风，所论碑帖融合书风，特指以碑学雄强朴厚的体势、金石质感为骨架，兼取帖学灵动婉转的用笔意趣，打破碑、帖壁垒的行书创作范式。其中师法赵之谦、何绍基者众多，俨然和“二王”、颜真卿行书风格呈分庭抗礼之势。本文以第五、六、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奖入展作品为例，引之统计学中的线性回归曲线、大数据分析，从而剖析当代行书创作中的审美取向和发展前景。

2 用数据说话——有关当代行书创作中的“二王”书风的三个结论

近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和展览活动均以浙江绍兴为中心。第四届兰亭奖第五届兰亭奖获奖入展作品共计198幅；第六届兰亭奖获奖入展作品共计57人，每人入选3幅作品，共计171幅；第七届兰亭奖获奖入展计54人，每人入选3幅作品，共计162幅；以此为统计基数，通过统计学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作者简介：郝璐佳，曼谷吞武里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书法研究。

文章引用：郝璐佳. 统计学视野下的当代行书创作中的“二王”书风研究——以近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为例[J]. 现代艺术与传播，2026，1(5)：152-157.

https://doi.org/10.68070/bd148a90

结论一：“二王”风格的行书入展率呈现逐届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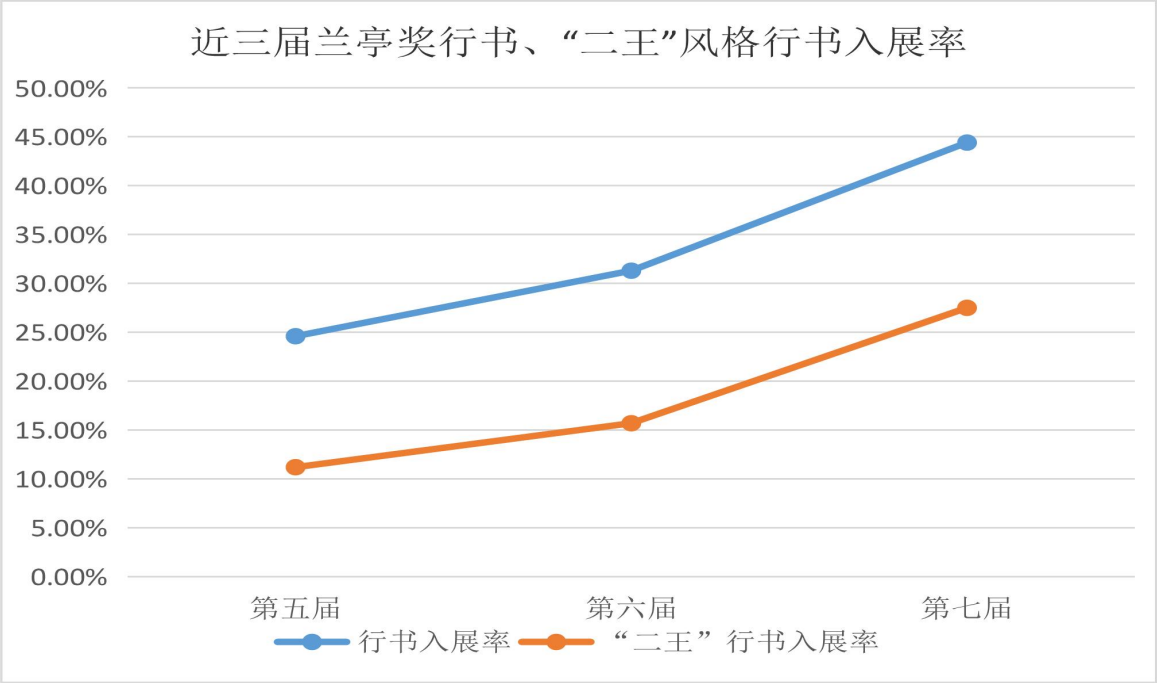


图 1 近三届兰亭奖行书、“二王”风格行书入展率折线图

从图1可知，近三届兰亭奖行书、“二王”风格行书的入展率逐届提升。第六届至第七届兰亭奖之间区域，产生较快增幅，行书入展率的增幅达到13.1%，二王风格行书的入展率增幅达到11.8%。第七届兰亭奖的“二王”风格行书的入展率达到“峰值”。第五届兰亭奖的“二王”风格行书入展率较低，仅为11.2%。

结论二：以“二王”行书风格为基的作品呈现展大化态势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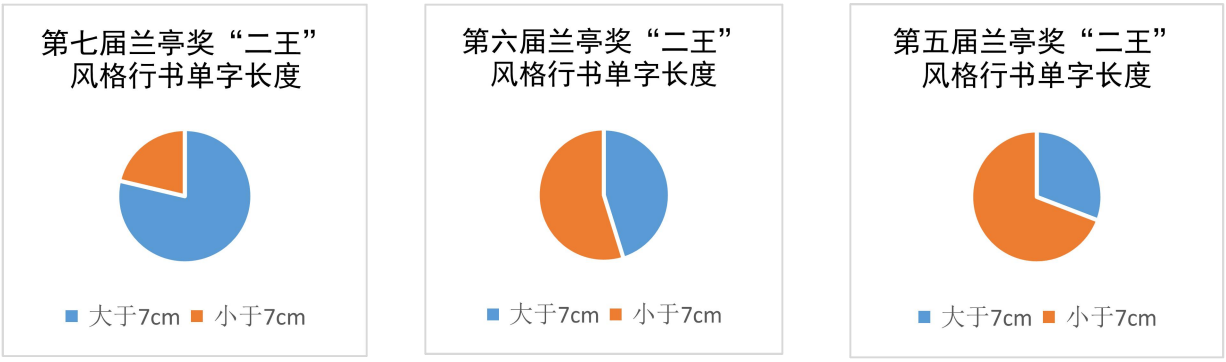


图 2 第五、六、七届兰亭奖“二王”风格行书单字长度饼状图

单字字径的增大，是近三届兰亭奖中“二王”行书风格入围作品的显著变化。第五届兰亭奖的“二王”风格行书单字字径大于7cm的作品仅有八幅，小于或等于7cm的入围作品有18幅。第六届兰亭奖的“二王”风格行书单字字径大于7cm的作品为14幅，小于或等于7cm的入围作品有17幅。第七届兰亭奖的“二王”风格行书单字字径大于7cm的作品有37幅之多，小于或等于7cm的入围作品仅有10幅。由表2、3、4可知，蓝色区域由第五届的占面积总比30.8%，发展至第六届的占面积总比45.2%，最终达到第七届的占面积总比78.7%。

结论三：“二王”行书风格多变，碑帖融合书风单一。

https://doi.org/10.68070/bd148a90

表 1 近三届兰亭奖入围行书风格统计表

师法 \ 兰亭奖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总计
“二王”风格	王羲之	4	5	8	16
	王献之	2	3	4	9
	米芾	6	10	11	27
	苏轼	1	3	5	9
	赵孟頫	0	1	0	1
	董其昌	2	1	3	6
	王铎	6	6	12	25
	八大山人	5	2	4	11
颜真卿风格	颜真卿一脉	9	11	13	33
碑帖融合风格	碑帖融合一脉	22	20	16	58

由表1可知，近三届兰亭奖中的“二王”风格入围作品呈现“多元分布”之势。延续并发扬“二王”用笔者有米芾、苏轼、赵孟頫、董其昌、王铎、八大山人、白蕉、沈尹默等书家，而直接师法“二王”者不是多数。第五届兰亭奖中的“二王”风格入围作品呈现“师法者众”的局面，其中直追“二王”的入围作品有6幅，占入围行书总数的10.5%。同时，碑帖融合的入围作品有22幅，达到近三届兰亭奖“峰值”。第六届兰亭奖中的“二王”风格入围作品呈现均势，师法“二王”者有八人，师法米芾者有十人，师法王铎者有六人，八大山人、董其昌、赵孟頫、苏轼行书亦有入围者学之。第七届兰亭奖中的“二王”行书作品开始出现回归魏晋的局面，直接师法“二王”者有十二人，米芾、王铎、董其昌风格稳中有升。碑帖融合的行书风格仍以赵、何二人为主。

3 当代行书创作中“二王”书风变化之渊源

近三届兰亭奖中的“二王”书风，逐届提升入展率以及作品的单字长度，并形成“出自一脉而全面师法”的创作现状。其中“一脉”是以“二王”为轴心进而涵盖历代经典帖学面目的师法范围，“全面师法”则是既直接师法“二王”，又以“二王”为旨归追至米芾、董其昌、王铎等书家。“新帖学”的创作风尚推动着展览中“二王”行书作品的风格呈现，“二王”风格行书入围作品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力求对当下行书创作提出有益的探讨。

3.1 “包容”和“原创”——来自“二王”书法本体的卓越性

前文“结论一”、“结论三”已述，第五、六、七届兰亭奖中的“二王”行书风格作品的入展率逐届提升，其中入围作品的书貌一改“新帖学”发展中早期的单一样式。不能置否的是，碑帖融合行书的笔法实施空间更广，约束力亦远非“二王”一脉如此严谨。李刚田曾评及说：

碑派书法并没有像王羲之一脉有一个笔法的标准样式，这种无法可依反而给碑派书法一个自由探索的空间。[4]

这种“无法可依”在创作中产生了两种局面。第一，用笔尚碑，结字在“规律”和“个性”中倾向后者，并借此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行书风格。第二，结字雄强，用笔深受“二王”一脉影响。这体现出“二王”风格并非和碑派书法产生明确对立，近三届书法兰亭奖中的行书入围作品存在部分“以北碑为体，以‘二王’为筋脉”的风格表征。“二王”风格的包容性较强，从溯源处便体现出兼容的姿态。张怀瓘《书断》评及：

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载成今体。[5]

羊欣亦评：

兼撮众法、备成一家。[5]

在王羲之风格形成的初期，便有“广纳前人”的书写思维。于当时而言，书家并未过多牵涉创作的心态。其风格的形成是不自觉的审美思维和自身的文化底蕴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笔墨特征。“元常

（钟繇）专攻行书，伯英（张芝）独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羲献兼之”[6]，孙过庭对羲献父子草创书体时的兼容态度作了明确的表述。王羲之论书：

予少时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熹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与从兄洽处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7]

由此处，王羲之临习所见不同载体的书迹。不局限于卫夫人，进而兼顾其它。王羲之风格形成时的兼容思维决定着“二王”行书一脉具有强烈的包容性。

之所以能在近三届兰亭奖中逐届提升入展率，并呈现多种书写样式，这和“二王”书法本体具有的“原创精神”息息相关。王羲之传世的部分手札摹本各具面貌，孙过庭评及：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陟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唉已叹。[8]

孙过庭解读在创作不同作品时，王羲之以不同的心境书写出不同的风格。同时，作为“二王”书风的另一位核心人员，王献之在师法右军之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原创精神”。张怀瓘论及：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草行之间，于枉法顾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宜局而执。[9]

其文体现出王献之对于“变体”的推崇，献之不拘泥于右军的身影下，想要一改章草，使“草之宏逸”，并且勇于实践，最终形成独特的王献之书风。清人梁同书在《频罗庵论书》中说道：“古帖不论晋唐宋元，虽皆渊源书圣，却各有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随人索取，如蜂子采花，鹅王择乳，得其一支半体，融会在心，皆为我用”[10]，此段论述对于“二王”一脉帖学的“原创精神”作出明确评价。后世学“二王”者多，出“二王”者则成为了历代书法大家，有如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王铎。正是由于“二王”书法本体所带有的包容意识和“原创精神”，近三届兰亭奖中的“二王”风格行书作品逐渐脱离雷同，并杜绝了“新帖学”发展中早期的“拷贝”行为。

3.2“展厅效应”和“评审风向”——当代“二王”书风变化的外在动力

从书斋走向展厅，“二王”风格的行书在经历了“米芾热”、“王铎热”、

“手札热”后，逐渐回归到书写的本质即追求笔法的时代传承。由“结论二”可知，以“二王”行书风格为基的入展作品呈现展大化态势发展。部分入围作品取法“二王”、米芾手札，并参以孙过庭《书谱》，在笔法细节上融合一些较为火热的当代行书名家的风格，最终形成那一时期的“二王”展览书体。

1. 展厅效应促使“二王”书法由重形式转向重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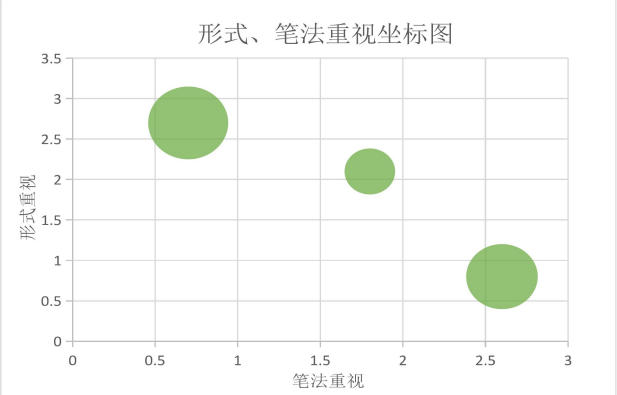


图 3 近三届兰亭奖行书作品形式、笔法重视坐标图

上图是第五、六、七届兰亭奖“二王”行书风格入围作品关于笔法和形式的重视坐标图。左圆y轴2.2——3.2，x轴0.4——0.9轴区域为第五届兰亭奖“二王”作品的书写现状，其中入围作品对于作品形式的关注远超对“二王”一脉笔法的关注，作品表达依托于形式，笔墨特征被弱化，趋于同质化。中圆y轴1.8——2.8，x轴1.6——1.9区域为第六届兰亭奖“二王”作品的书写现状，其中重视笔法的“二王”一脉作品开始增多，一些长篇竖幅式（非楹联）作品崭露头角。单字长度小于7cm的“二王”行书风格作品有17幅，其中多数仍表达出对于形式美的重视，笔法尚未完成对于“二王”一脉的回归，由此出现了少量个性化极强的行书作品，这是形式美和“用笔千古不易”碰撞后产生的后果。右圆y轴0.4——1.4，x轴2.4——2.8区域为第七届兰亭奖“二王”作品的书写现状，其中推崇用笔的作品已经成为其中的多数，“形式美”不再是“帖学”书写者首先关注的元素。其实不光是“二王”一脉的入选书家，颜真卿风格和碑帖融合风格的入围行书均在笔法上有所探求，而对于纸张样式、纸张颜色、多印章等形式元素追求达到近三届兰亭奖的最低值。无论是第五届兰亭奖中“二王”行书入围作品对于形式的重视，还是第七届兰亭奖“二王”作品回归到关注用笔，都是不同创作周期的二王书法对于“展厅文化”产生的适应结果。相比于碑帖融合流派，“二王”一脉对于展厅的适应较为漫长，甚至比颜真卿一脉适应的更为滞涩。毕竟从“书斋文化”走出的“二王”书法习惯了雅致，孙过庭

https://doi.org/10.68070/bd148a90

《书谱》评为:

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11]

“不激不厉”、“志气和平”是对于王羲之书法气质的高度概述，虽然后世米芾、王铎有诸多跌宕的处理，但整体上“二王”笔法的传承都是点画严谨且控制力强的。这导致“二王”书法在“展览时代”初期，体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2. 评审风向由“顺风”转至“造风”。

在当代“展览至上”的环境下，带有竞技意识的“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中国书法兰亭奖”经过多层遴选，进而选出的获奖入展作品（兰亭奖是当下唯一保留评选等级的全国性赛项）往往会在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展览赛项中引起创作热潮。在这一系列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全国性赛项的评审机制以及评审风向既能顺应当下的创作热潮，亦能转变时风进而避免当代书法发展走向歧途。前者的功能在于为当下流行的创作风尚助力，让已燃起的审美之火更加猛烈，从而形成全国性的创作热诸如“王铎热”、“米芾热”、“赵之谦手札热”。后者的功能在于为当下易受各种思维冲击的书法创作保驾护航，当一种创作热潮的流行已经严重影响甚至挤压了其他书写体系的普及和传承，那么评审机制和评审风向就会伺机而动，扭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跟风、模仿、复制行为。以第六届书法兰亭奖为例，本届兰亭奖的评审风向就有“造风”的效果。首先在评审机制上，本届兰亭奖在原有的评审机制下做出适应当下创作现状的调整。第一，取消往届由票数多少由高向低一次性的投票机制，变更为评委集体评分的机制，并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第二，首设评选审议组，负责设立获奖等级线。第六届兰亭奖评审机制的调整无疑是增加集体意志的话语权，评审风向也逐渐向多数靠拢。而评审机制的调整直接影响到对于作品的选拔，如果评审结果能够逐渐和评审眼光、审美倾向产生分歧，那这种分歧便是接近客观的学术立场。

4 关于当代“二王”书法创作的发展和期盼

当前，关于传统帖学创作的困境在于师法“二王”，如何适应“展览时代”创作的要求。怎样在取法王羲之一脉的法帖时，能够和具有形式感的“展览作品”契合。这些命题都会在接下来的创作周期内，引导着当代帖学书家亲赴实践。

4.1 取法多家引发风格的拓展

“二王”书法之所以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均能迸发出新的活力，并未被后来的学书者摒弃。原因就在于“二王”书法本身具有的“原创精神”和包容性。同样，凡是“二王”一脉的经典法帖，都可成为学书者临习的范本，甚至在帖学的范畴下，不同朝代的经典法帖皆可学、皆可为我所用。而“二王”体系的排他性，体现的并不明显。所以，取法多家是丰富艺术语言的重要方式，也是学习不同笔法形态的主要途径。“当下书法创作有感于书法中“古学”转向“今学”，善于以古代某一为大家、某一种风格为依托，从而古为今用，而获得行书拓展和创新的成功”，以行书一家为创作基底所产生的书写风格，优势在于较快的初具个人风格，弊端在于风格趋向雷同。“二王”书法风格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书家赋予了新的含义。在唐代，理论家们对于“二王”和那一时期的书法家们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述。释亚栖在《论书》中说:

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能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12]

唐人在“学古”和“学今”中达到平衡，形成了诸多个性强烈的书写风格。唐代书家对于书写的拓展，无疑对于当下书家的创作有所帮助。

4.2 笔法愈加受到书家的重视

魏晋以降，笔法成为历代理论家的着墨之处。经过经验总结的“用笔观”便是“笔势”、“笔法”的初期范围。翻阅历代经典的论书理论，都在论述用笔方面不遗余力。直至近代白蕉，其文《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仍花费大量的篇幅用以探讨关于笔法的玄妙之处。可以这么说，书论中有关“笔法”的论述在古代书法理论史上一直是主线之一，而历代的帖学实践也仅仅围绕着“笔法传承”的命题，这种发展有序的“二王”实践在当代遇到了新的挑战。“二王”书法在“展览时代”初期，为适应新时期的创作特征，“笔势”和“笔法”发生异变，由对两者的“读”变为对于点画形态和点画姿态的“看”。由于需要在当前的评审机制下，尽可能的从众多同类作品中跳出来，唯有选择用笔特征化的捷径。毕竟书斋中传承的“二王”体系在竞技赛项下缺乏足够的竞争力。第五、六、七届兰亭奖，“二王”风格的行书入围作品逐渐转向对于笔法的重视。毕竟“书写线条是书法的核心命题”，而竞技赛项在经历形式品判后，必然会回归到书写的本质即关于笔法的探求。第六届兰亭奖中“二王”风格作品对于笔法的实践并非是一个终点，而是创作新周期的起点。在接下来的“新帖学”实践中，笔法仍将是“二王”一脉书家着力追求的重点。

综上，通过对近三届兰亭奖中“二王”行书风

格作品的研究，借此对于当代行书创作进行了现状分析，发展解读以及前景预判。同时，“二王”书法沿袭至今，在时代和“古法”之间找到契合点，将是下一个帖学创作周期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1] 白巍，戴和冰，朱天曙. 书为心画：中国书法[M]. 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3：130.
[2] 张弘. 王羲之书法鉴赏[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2004：5.
[3] 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 中国书画全书：第六册[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55.
[4] 李刚田. 王羲之书法的渊源与流变[J]. 中国书法，2019(5)：61.
[5] 荣宝斋书谱·古代部分·王羲之·尺牍[M]. 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3：36.
[6] 许礼平，苏士澍. 孙过庭书谱[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79.
[7] 崔尔平，选编. 历代书法论文选[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27.
[8] 中国古代书法名卷·书谱[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8.
[9] 毛万宝，黄君，编. 中国古代书论类编[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862.
[10] 洪丕谟. 书论选读[M].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248.
[11] 崔尔平，选编. 历代书法论文选[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129.
[12] 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 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87.

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Two Wangs" Calligraphic Style in Contemporary Running Script Cre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Recent Three Chinese Calligraphy Lanting Awards

Hao Lujia

Bangkok Thonburi University, Bangkok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unning script works featuring the "Two Wangs" style selected for the 5th, 6th and 7th Chinese Calligraphy Lanting Award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adopts methods such as relationship modeling and data extraction in statistics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exhibition admission rate of running script works in the "Two Wangs" style has been increasing steadily across successive sessions; second, such works show a general trend of enlarged format; third, the "Two Wangs" running script boasts diverse styles, while the school that integrates stele inscriptions and model calligraphy works presents a converging appearance. The stylistic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Two Wangs" running script creation is internally constrained by the inclusiveness and original spirit of calligraphy itself, and externally driven by exhibition effects and judging orientation.

Keywords: Lanting Award; Contemporary; Running Script; "Two Wangs"

https://doi.org/10.68070/bd148a90